



学习鲁迅文艺思想

10.96

山东人民出版社

学习鲁迅文艺思想

蓝海 来祥 崇恩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9·220 定价：0.25 元

目 录

- 一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学习鲁迅爱憎分明，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思想……（1）
- 二 革命文艺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
——学习鲁迅对政治和艺术关系的论述……（21）
- 三 选材要严、开掘要深
——学习鲁迅对创造典型人物的论述……（35）
- 四 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
——学习鲁迅的创作方法和创作道路……（54）
- 五 剪除恶草，灌溉佳花
——学习鲁迅对文艺批评的论述……（71）
- 六 大众语是毛坯，加了工的是文学
——学习鲁迅对文学语言的论述……（85）

七 我们不单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
开拓者和建设者

——学习鲁迅对文艺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论述…………… (94)

八 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

——学习鲁迅对革命文艺队伍思想建设和组织建
设的论述 …………… (105)

一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学习鲁迅爱憎分明，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思想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鲁迅开始是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参加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后来他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他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以上均引自《新民主主义论》)这个文化新军的威力，使国民党法西斯的文化“围剿”一败涂地，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

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我以我血荐轩辕

一九〇二年鲁迅到日本留学以前，他经历了戊戌变法、义和团的反帝斗争运动；他学习了自然科学知识，接触了外国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这使鲁迅对中国的问题比以前有了较多的理解和更深切的关心。这一时期他的诗篇《自题小像》，充分显示了他忧愤的感情以及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的决心。这首诗成了他毕生的誓言。在日本留学时，鲁迅积极参加了反清的活动，接触了一些革命的人物，走上了拯救祖国的道路。

作为一个革命家，鲁迅最初选择医学的道路，是因为他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意图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以后他所以弃医学文，是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这说明，无论是学医或是学文，鲁迅都是为了救国。因此，他歌颂了立意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的摩罗诗人，为的是其“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以起其国人之新生”。（《摩罗诗力说》）他译《域外小说集》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鲁迅认为文学“必须是‘为

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开始就以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了。

在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才子们写的作为消闲的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时代，鲁迅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仅作茶余酒后消闲之用的错误观点，而主张文艺应成为政治、思想斗争的工具。这是他不同于当时其他作家的地方。

新文学运动中“为艺术的艺术”派主张文艺是“内心的要求，自我的表现”，鲁迅将它“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为人生的艺术派虽然也主张文学是为改良人生的，他们也往往由现实出发，却终于走到唯心主义的幻梦中去。例如不少人主张用抽象和神秘的爱和美来改良人生。鲁迅却始终清醒地执着于现实。从他开始进行创作起，取材即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自己说他那时“听将令”的“呐喊”，为的是“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呐喊》自序)这呐喊，是文化新军的进军喊叫，是发自“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的进军的喊叫。这说明鲁迅的文学创作和当时革命斗争的步调是一致的。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之后，更是自觉地把文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使他的文艺活动从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从来未有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精神。作为这个文化新军旗手的鲁迅，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精神。以反对旧道德、旧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新文艺，多半

具体反映在反对男尊女卑，包办或买卖婚姻，封建的贞操观、节烈观等等问题上。而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就深刻地解剖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和罪恶，并预言了这种社会的必然灭亡。继狂人之后，他又写了许许多多的被吃者：阿Q、祥林嫂、爱姑、子君、孔乙己……等。这些人物都处在浓重的、压得使人窒息的封建势力的包围中。这是鲁迅这一时期对封建社会的基本认识，也是他写作的基本主题。在一九二五年写的《灯下漫笔》中，鲁迅形象地概括了封建社会的本质，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这就彻底地否定了统治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封建制度、封建道德和封建伦理等上层建筑。对两千年来传统的是非观提出了挑战，使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

阶级压迫是鲁迅注意的另一个问题，也是他在作品中充分反映的一个问题。象他说的，“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灯下漫笔》）他创造的艺术形象中，如赵太爷、钱太爷、七大人、尉老爷、假洋鬼子、赵秀才、鲁四老爷、丁举人、白举人等等，都是吃人的上等人。阿Q、小D、祥林嫂、单四嫂子、爱姑、孔乙己等等，都是被吃的下等人。在鲁迅思想中，“上等人”和“下等人”，“吃人者”和“被吃者”，

是一有条明确的界限的。他所说的以文艺来改造他们的精神，开出反省的道路，只是对着最大多数被迫害的不幸的人们。他对于这些人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曾说：“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他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压迫，很多苦痛。一九三二年，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他回忆“五四”时期的情形：“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挣扎；……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为了“救救孩子”，鲁迅借狂人的口喊出：“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他于一九二五年说：“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灯下漫笔》）他关心下一代，寄希望于下一代，等待着一个大的变革的来临。他相信除去这重压的大时代必然到来。他认定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旧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他不愿这样因袭下去，更不愿青年们“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希望“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故乡》）在《北京通信》中，他劝告青年们“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他最初寄希望于辛亥革命，后来辛亥革命使他亲眼看见什么也没有变，“内骨子

是依旧的”，使鲁迅认识到中国需要“新的山崩地塌的大波”，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的大波，没有真正的革命，所以一切“依旧”，（《马上日记之二》）“旧物”没有扫荡，新生命就没有诞生的机运。

反戈一击，易致强敌的死命

地主资产阶级总是把文学说成“高尚”的、超现实的东西。鲁迅用中国文学史的实例证实：“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又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可以看出，他在早期即认定没有超政治、超社会的文学。在《论睁了眼看》中他认为“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当他到了广州后，锐利地看出所谓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实质上并没有变，社会没有改变，文艺也没有改变，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有的仍然是“超然物外”的“旧人”的“旧文学”。革命策源地已变成“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这使鲁迅感到失望，他不能不同“旧人”和“旧文学”斗争了。这时，中国共产党派人和他经常接触，在工作上给他以支持。

对于“旧人”、“旧文学”，鲁迅是作为封建社会的代表来对待的。封建思想，是借文学来宣传的，封建统治是借人来进行的。他在一九三四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

私怨”。我们纵观鲁迅一生的战斗生活，可以说都是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虽然多半是通过个人，实际并不是为了个人的仇怨。以《华盖集》及其续编而论，是鲁迅极其猛烈地向土绅士、洋绅士等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人物战斗的记录。在这里，所有被抨击的人物，应作为各种典型人物来看待。

从旧营垒中来的鲁迅，对旧营垒自然最熟悉，更由于他具有锐敏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分析力，象他自己说的：“因我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致强敌的死命”。在反对复古主义、国粹主义和一些土绅士、洋绅士的斗争中，他之所以处处击中敌人的要害，就是由于他熟悉敌情的缘故。他在与陈西滢、杨荫榆论战时，揭他们的老底是那末彻底；在与学衡派论战时，指出他们不过是连“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就妄图“衡”什么“轻重是非”的人。他们以学贯中西相标榜，可是鲁迅有力地证明了他们“于旧学并无门径”，不过在谬托“国粹的知己”罢了。

鲁迅的反复古主义，反国粹主义，是有其深远的用意的，那就是为了将来。那些复古主义者、国粹主义者，“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鲁迅认为：“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因为“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随感录三十五》）鲁迅的态度之所以这末决绝，因为他洞察到那些僵尸们不是仅仅“掙击新文化而

张皇旧学问”就作罢，而是要以腐朽的封建思想扑灭新思想，恢复旧制度。为了保卫新文化，为了“将来”子孙的时代，他才那样彻底地批判复古派与国粹派。

横眉冷对千夫指

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是反革命文化“围剿”和反“围剿”的十年。在反“围剿”的十年战斗中，鲁迅更勤奋地学习马列主义，不断地解剖自己，成为愈战愈强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曾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自然，说鲁迅由此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论是符合事实的，这由他到上海后的书账和以后在溧阳路建立的专藏马列主义书籍的秘密读书室，都可以证明。但若就此说鲁迅是从这时开始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就不完全对了。远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夕，他就购买阅读了《露国现代之思潮及文学》，其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作家戈里基（即高尔基）”。当时有人把高尔基的《意大利的故事》中的第十一篇译成中文，送往教育部审定登记时，鲁迅对这项工作极为赞许。一九二〇年六月，陈望道把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寄赠鲁迅，鲁迅读后，称赞他“这个工作做得好”，指出“这倒

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可见那时鲁迅就把学习、宣传、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看作是“最紧要”的任务了。总起来说，鲁迅在北京的时候就购买阅读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一九二五年，鲁迅为任国桢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作了校订，写了《前记》，并编在《未名丛刊》中，为它设法出版。一九二六年他为胡敦译的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作了校订，并补译了《勃洛克论》，写了《后记》，编入《未名丛刊》。这些说明，在北京时他已注意研究苏联文学，并致力于把苏联文学介绍到中国来。而这《前记》和《后记》本身也说明他对苏联文学有较深刻的研究和理解，绝不是仅一知半解所能写得出的。一九二五年他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导下，总结了革命者的血的教训，写出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一著名文章，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战斗口号。特别是近年来发现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是一九二七年四月鲁迅在广州写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中四次提到列宁，全文根据列宁的一段语录立论，分析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的政治形势，提出了“永远进击”的革命主张。这些重要材料一再说明，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鲁迅日益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一方面解剖自己，一方面努力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革命的形势，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导革命斗争的发展。

鲁迅思想的发展，反映在他对青年的看法上。这种看法逐步摆脱进化论的束缚，也不是从广州“四·一五”政变才

开始的。鲁迅在厦门时期的信中就说：“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而他们竟自以为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觉得他们无自知之明，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小’的地方。”更早的一九二五年五月，他曾说：“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据当时中山大学的中共总支书记回忆，鲁迅到中山大学的前后，中共粤区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直接抓中大的工作，亲自布置欢迎鲁迅，并指定中大学生粤区学生运动委员会的副书记毕磊等去同鲁迅接触，要他们在一定的时候带些党内刊物象《少年先锋》、《人民周刊》等给他看。在不断地接触中，鲁迅对代表共青团向他做工作的青年更为热情，青年们对他也发生了感情。他不仅对国民党的“左派青年团”另有看法，且对于他们捣乱和破坏共青团的活动，表示非常气愤。在这期间，他曾向毕磊提出要同陈延年同志见面。见面后，陈延年同志总结了前一阶段对鲁迅的工作，认为鲁迅的转变是很好的。“四·一五”广州反革命政变，毕磊被捕牺牲了，鲁迅在《怎么写》中纪念了他，这反映了他对党对革命青年的深厚感情。就这些情况来看，这时鲁迅逐渐以阶级观点分析青年，不是一概而论了。他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鲁迅的进化论思想被轰毁，世界观起了决定性的质变，应该说是从这时开始的。关于对

青年有所分析的观点，关于他的立场和感情的变化，则不是“四·一五”以后才开始的，而是从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就有所区别了。

思想转变需要一个过程，是自然的，但应该承认一个人的思想在任何时期都有一个主导思想。在转变期，鲁迅自己说他的进化论思想“轰毁”了，难道“轰毁”了的思想还可以成为他的主导思想么？我们所以说这些情况，是为了说明鲁迅到上海后，他反文化“围剿”的决心、信心、力量的源泉，他比过去更为锐敏、深透的洞察力的来源。假若没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主导思想，没有对人民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他是无从产生这种伟大的力量的。

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在他一生特别是后期的战斗中，总是严格区分敌、我、友，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主要的敌人。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他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对朋友是有团结、有斗争，他曾严肃地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及他们所鼓吹的“革命文学”中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目的是指出正确的方向，团结他们向主要的敌人展开进攻。即使在同一战阵中的朋友围攻和嘲骂他时，他也是以他“匕首”和“投枪”般的杂文，集中主要力量，朝着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便是他对敌人坚决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的突出表现。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揭露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戳穿了封建僵尸们的丑恶面貌，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军阀和各种反动势力的罪恶行径，深刻地

暴露了帝国主义者的反动嘴脸，“袭击”了为反动统治服务的所谓“古文明”和洋奴文化，愤怒地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革命、屠杀革命群众及共产党人的残暴罪行。在反“围剿”的光辉战斗中，他彻底批判了“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家、“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等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指出他们虽然打着各种不同的旗号，拿着各种不同的武器，但实际上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推动文化革命逐步深入，粉碎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配合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粉碎蒋介石反革命军事“围剿”的伟大斗争，促进了农村革命的深入。

“新月社”的主要代表人物不过是一群欧化的绅士，早在一九二三年他们就投靠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围攻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力量。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他们就立即麇集上海，投靠了新军阀蒋介石。他们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对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文化“围剿”。他们以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为武器，以反对“硬译”为借口，否定文艺的阶级性，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鲁迅针对梁实秋鼓吹的“永久不变的人性”，写了《文学与出汗》、《“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著名文章，从政治上、理论上对新月社鼓吹的“人性论”作了全面、彻底的批判。鲁迅尖锐地指出：“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梁实秋自己写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就“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挥戈一击，就揭露了梁实秋之流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中，鲁迅更从政治上指出：新月社的“一伙”，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思想文化界的“刽子手和皂隶”，彻底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

“民族主义文学”是在反动派的指挥刀保护下杀出来的一簇人马。在它出现前，国民党反动派禁期刊，禁书籍，封书店，大杀大砍了一阵，为“民族主义文学”开路。这时，又是鲁迅彻底地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他指出：他们虽然发宣言，出刊物，而且刊物出得“已将十种，然而这也失败了。”在著名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中，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作品进行了剖析。证明他们连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没有资格讲，因为他们一心一意盼望的是跟在新的主子——日本法西斯军阀的后面去讨伐斯大林的苏联。他们实质上是适应国民党反动派投敌卖国的需要，为日本侵略者开辟道路的“最要紧的奴才”和“有用的鹰犬”。

苏汶、胡秋原之流，以超阶级、超现实的“第三种人”或“自由人”自居，可是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社会中，却向左翼文坛要求创作的自由，诬蔑当时的左翼文坛事实上是横暴的。鲁迅令人信服地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论“第三种人”》）非此即彼，“第